

浙江山水文学史

何方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山水文学史/何方形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5
ISBN 978-7-308-20209-1

Ⅰ.①浙… Ⅱ.①何… Ⅲ.①地方文学史—浙江
Ⅳ.①I209.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74973 号

浙江山水文学史

何方形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吴 超
责任校对 闻晓虹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63 千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209-1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目　录

导　论　浙江山水文化与山水文学综论 …… (1)
第一节　浙江历史、地理简述 …… (10)
第二节　浙江旅游资源略说 …… (13)
第三节　浙江旅游、山水文学的精神原型 …… (19)
第四节　浙江山水名胜楹联艺术论略 …… (23)
第一章　唐前浙江山水文学 …… (28)
第一节　简说 …… (29)
第二节　王羲之、孙绰的山水诗文 …… (33)
第三节　沈约、吴均的山水诗文 …… (40)
第二章　谢灵运山水诗 …… (46)
第一节　谢灵运生平 …… (48)
第二节　取径多元的谢灵运山水诗 …… (52)
第三节　谢灵运山水诗的情感世界 …… (59)
第四节　谢灵运山水诗的意象美 …… (64)
第五节　谢灵运山水诗对浙地山水文学的影响 …… (75)
第三章　唐代浙江山水文学 …… (84)
第一节　简说 …… (84)
第二节　浙江唐诗之路概述 …… (90)
第三节　寒山的山水诗 …… (109)

第四节 顾况、孟郊、皎然、钱起等人的山水诗 …… (112)
第五节 方干、罗隐等人的山水诗 …… (120)
第四章 宋代浙江山水文学 …… (125)
第一节 简说 …… (125)
第二节 林逋、赵抃、杨蟠等人的山水诗 …… (142)
第三节 陆游的山水诗文 …… (146)
第四节 王十朋、吕祖谦、叶适等人的山水诗文 …… (158)
第五节 “四灵”及戴复古的山水诗 …… (166)
第六节 舒岳祥、汪元量等人的山水诗 …… (174)
第五章 元代浙江山水文学 …… (181)
第一节 简说 …… (181)
第二节 戴表元、赵孟頫等人的山水诗文 …… (188)
第三节 陈孚、黄庚等人的山水诗文 …… (193)
第四节 杨维祯的山水诗文 …… (197)
第五节 张可久的山水散曲 …… (204)
第六章 明代浙江山水文学 …… (208)
第一节 简说 …… (208)
第二节 刘基的山水诗文 …… (223)
第三节 谢铎、王守仁、徐渭等人的山水诗文 …… (231)
第四节 王思任、张岱、祁彪佳的山水诗文 …… (241)
第五节 徐霞客笔下的浙江山水 …… (248)
第七章 王士性山水诗文 …… (259)
第一节 王士性生平 …… (259)
第二节 王士性的旅游文化思想 …… (262)
第三节 王士性的山水散文 …… (265)
第四节 王士性的山水诗 …… (270)
第八章 清代浙江山水文学 …… (278)
第一节 简说 …… (278)
第二节 张煌言、黄宗羲的山水诗 …… (289)
第三节 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的山水诗文 …… (292)
第四节 齐周华的山水散文 …… (304)

第五节 袁枚的山水诗文 …… (306)
第九章 近代浙江山水文学 …… (315)
第一节 简说 …… (315)
第二节 龚自珍的山水诗文 …… (317)
第三节 俞樾、沈曾植的山水诗文 …… (319)
第四节 秋瑾的山水诗文 …… (324)
参考文献 …… (328)
后 记 …… (337)

需要全本请访问

导　论　浙江山水文化与山水文学综论

石涛(1642—1718?)《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章第八》有言:“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①]山水文学创作就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中国山水文学的孕育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也深含社会和文化传承因素。左思(250?—305?)《〈三都赋〉序》的一段话正可以用来论述山水文学的创作缘由与美学价值:“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人类与自然,朝夕相对,休戚与共。“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孔尚任《〈古铁斋诗〉序》)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大自然洋溢着生机,也给人以无限的诗情画意,从而触引出士人风发泉涌的灵感兴会,歆慕天地之大美,企慕隐逸,向往高蹈人生,游心于山水自然之间。王维(701—761)《请施庄为寺表》的“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应该是人们山水审美,寄情于自然山水、适性而已的基本取向。人们欣赏山水相得之美,啸傲泉石,寄情山林。宗白华在《美从何处寻?》一文中指出:“专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②]人们又往往要为表达一种抽象的情感去苦苦寻觅客观对应物,而自然山水正是最为合适的对象之一,既成为一种美的载体,也往往带来情感表现的强化。

---

① 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3 页。

②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 页。

法国学者埃莱娜·西苏曾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当写作是发自内心的行为时,它甚至是地狱中的天国,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方式获得拯救,作家是富有者。”[①]这要是用来阐述山水文学的创作缘由是颇为确切的。人们敏感于自然物色的刺激,以寻山问水为志趣,对自然关注和热爱,饱览奇景伟观,又领悟自然真意,或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归依,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些客观事物以表情达意,才有了一曲曲吟唱大自然的恋歌。所以,山水文学是人类崇尚自然的必然产物。人们在看山听水的时候,往往引发心灵的触动,有着最为真切的人生感受,也有着对人生的一份洞悟,从而反映出特定的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象。如张岱《家传》载其祖张汝霖(1561?—1625)的中晚年生活与创作情况:“辛亥朱恭人亡后,乃尽遣姬侍,独居天镜园,拥书万卷,日事绀绎。暇则开山九里,每日策杖于猿崖鸟道间,作《游山檄》,遍游五泄、洞岩、天台、雁宕、玉甑诸峰,诗文日尽。”固然人们感叹“景物从人赏,登临著句难”(戴复古《赵寿卿西屿山亭》),但这样的创作无不立足于自己的体验与感悟,表达对自然风物的热爱,进而传达艺术家对历史、人生和宇宙的深层体验,刻下心灵和生命的印痕,演绎着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较大的意义上实现了白居易(772—846)所谓“遍寻山水自由身”(《闲行》)的人生理想。而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深刻的感悟,诗人必须打造相应的文体形式。于是,作为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以山水文学为主体构成的山水文化就称得上是中国式艺术精神最集中、最充分也最完美的体现,因为“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朱熹《次秀野极目亭韵》)。山水文学往往表现为不满现实而又无法改变现实的一种精神与情感的转移,写出人生情思的深微处,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审美价值,承载极为深厚的文化精神,极具文化史意味,也有着多元的艺术品格。维·什克洛夫斯基在其《散文理论》中说:

> 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②]

① 〔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3 页。

② 〔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 页。

这也适合于关于山水文学的审美判断。

固然一切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文化的发展总是呈现出积累性的特性，意脉相贯。别林斯基(1811—1848)《一八四〇年的俄国文学》指出："文学表现出民族精神的发展；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重要方面。"[①]山水文学自然也一样。弗洛伊德(1856—1939)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指出这样的文化现象："在精神生活中，一旦形成了的东西就不再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保存了下来，并在适当的时候……它还会出现。"[②]这同样也适合评判中国的文化现象与文学创作历史。郭熙(1000？—1090？)在他的《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③]郭熙从不同的侧面论及人们与山水之间的亲密关系。

审美从来都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山水文学史上留下的动人篇章，是一个包孕非常丰富的话题，或者说是一个具有恒久生命力的主题。人们也可以从山水文学的层面去探测时代足音。如果追溯其最初渊源，从大的意义上说，曹操(155—220)等都是表现这一艺术情怀的先驱。王士祯(1634—1711)《带经堂诗话》卷一甚至认为："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乐、宣城，盛唐王、孟、李、杜及王昌龄、刘眘虚、常建、卢象、陶翰、韦应物诸公，搜抉灵奥，可谓至矣。然总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二语，此老殆不易及。"[④]韩作荣《说不出来的话》："灵魂、精神或心灵，这存在而又虚妄的看不到、不可触摸的范畴，其本身就是无法触及、无法超越的。想实在的把握，如同用手去捉光线一样愚不可及。可诗人就是这样的愚不可及者。"[⑤]山水诗人大多属于这一"愚不可及者"群体，卓绝一世。

贯休《上杭州令狐使君》："爱山成大癖。"浙江历代文学家也不例外，人融化在大自然中，有着纵情山水、不为物累的心性，息心林泉，体玄悟道，安身静心，即杨蟠所说"峰北看云忘世务，涧南听水得天真"(《山中回忆东山

①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0 页。

② 〔瑞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8 页。

③ 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32 页。

④ 王士祯著，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7 页。

⑤ 韩作荣：《诗歌讲稿》，昆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

老》),找到真正能够安顿心灵的居所。“行尽江南都是诗。”(萨都剌《重过九华山》二首其二)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一书中指出:

> 山水诗是继神话之后,在文学创作上大自然的又一次人化。这一诗歌发展的必然阶段,便通过谢灵运旅人的心情而表现出来。①

自谢灵运确立我国山水文学的审美化范式之后,人们越来越注重在对自然的审美中提炼诗情,山容水态成了人们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如张岱《祭周戬伯文》:“余独邀天之幸,凡平生所遇,常多知己。……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浙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郦道元《水经注》卷四〇),客观山水给人以触发,人们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作者身处各个时期的自我角色意识,属于不同美学观的呈现,又多能随着时代不断前进,胎息前贤而加以变化,艺术技巧趋于多样,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体现出山水审美经验的丰富与发展。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说:“无论是一出戏剧,一部小说,或者是一首诗,其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文学的传统和惯例。”②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有所依傍,自觉或不自觉。朱立元《接受美学》也指出:“每个时代的每个作家,当他执笔投入创作之际,他是被此前的文学传统包围、浸染着的,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③文化精神薪火相传,但并不是原样继承。星移斗转,历史无情也有情。文学作品毕竟是文学史建构的主干。所以,拙著首先立足于纵向的考察,顺着古往今来的历史脉络展开叙述,从历时性的动态过程中,梳理和勾勒浙江山水文学发展轨迹,把握其求新求变的精神意脉流向。但也分析他们创作的具体情况,准确地探索因时运气脉之异而形成的时代与诗人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把一个时期的作家相对集中,以期同中见异,探讨每一个时期浙江山水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又属于横向的剖析了。谢榛(1495—1575)《四溟诗话》卷三:“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故尔。”④由

---

①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2—173 页。

②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72 页。

③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0 页。

④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184 页。

于自身生活阅历、性情心境及审美趣味的差异，人们的创作在具体意趣的确立、材料的选择使用、诗风的最后形成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着力实现微观与宏观并重，仁智自见。只有将这些不同作家、不同时期所创作的体式不一、风格独具的作品合而观之，才能真正把握浙江千余年山水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全貌。

山水诗文都是人们南北游历后抒发情感的自然结晶，其中尤以信笔所至、随意写来最受推崇。拙著在文化与文学关系的大背景下对此进行宏观考察，做出富有深度的描述和解析，着重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在前人的基础上如何取得突破，这是一种较为严峻的挑战。笔者深知，文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拙著正留下笔者几年来苦心研读有关山水诗文的足迹。

“爱山爱水成吾癖。”(查慎行《绿波亭》)在中国，喜山乐水可以说是跨越时空的士大夫意识，并不随着时代的前行而削弱与泯灭。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浙江历代文人有这一癖好者数不胜数。吕祖谦在给丞相周必大(1126—1204)的一封信中有“卧游”的畅想：“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兖之太极、华之云台，皆可卧游也。”(《与丞相子充书二二》)又如贝琼(1314—1379)《题王立本山水图》“我有爱山癖，每欲名山去”、王守仁《舍利寺》“一段沧州兴，沙鸥莫浪猜”与《四明观白水二首》其二“野性从来山水癖，直躬更觉世途难”等等。方孝孺在《龟岩隐居记》中深情表达“余少也好游，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乐乎心者，辄左右瞻眺”，甚至“栖身丹壑总忘归，水阁频登趣不稀”(《登归云寺阁》)。山水之好，归欤之志，可谓是浙地文人生命主旋律之一，也是他们的诗魂所在，群山众水于是得以各现风姿，而因为“试登山岳高”，也才能“方见草木微”(孟郊《上河阳李大夫》)。

“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韦庄《〈又玄集〉序》)浙江山水文学车载斗量，水深林茂，蔚为大观，并以不断创新的成果续写它曾经拥有的辉煌历史，呈示出一个不断孕育新变的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作家对山水题材的选择、对自然山水的审美理解及由此反映的精神意绪也有所不同，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历时性变化特征。浙江山水文学家都具有一种着力追求、开拓新意的精神，既追求情趣之新异，也谋求技艺之改进。浙江山水文学史真可以说是珠玑琳琅，绚丽灿烂，品读他们生动鲜活的作品就如同自我徜徉、流连于山水之间。浙江历史上每一时期都有执时代牛耳、主盟文(诗)坛的山水文学大家，如谢灵运、陆游、王士性、袁枚等，单是有明

一代，即有王士性之沉雄秀逸，王思任之诡怪奇崛，张岱之雅而俗，整而活……[①]这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是很难想象的。要完整、深入地探讨这一现象的产生缘由、发展脉络与辉煌成就，就像地平线上的雪山一样遥不可及。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择其要者而论之。

浙江山水文学家既有个人奋斗，也有群体探讨，并组成一个个较为强大的创作集团。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可谓雏形。唐代就有了一个不是很成熟的“睦州诗派”（唐时睦州辖有今杭州市的桐庐、建德、淳安等地），以后则有宋代以吕祖谦、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人的“永嘉四灵”，元代杨维祯、李孝光、吴莱等组合成的“铁崖派”。宋元之际，舒岳祥、戴表元、袁桷，一脉相承。明代，王士性与他的族叔王宗沐、族兄王士崧、族弟王士昌等构成临海王氏家族。人们各有林泉之志，诗情澎湃，缘物抒怀，切磋诗艺，兼收并蓄，各显神通。

浙江山水文学家以汉族为主体，但回、蒙等其他民族的作家也有不俗成就，有语意两工之妙，并且呈现出审美风格的多元化趋向。泰不华、迺贤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对山水都有着极强的感悟力和表现力。

浙江山水文学家既以经济相对繁荣、文化相对发达、交通相对便捷以至首先成熟的主体城市的作家构成主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全省各地尤其是一些相对较为偏远的地区也不断涌现一批创作群体，这表明浙江山水文学作家群体地域的逐步扩大与进一步完善，可见“旧婴诗病舍终难”（李中《赠谦明上人》）者大有人在。如林待聘（1089—1152），字绍伊，号毅斋，出生于现在的泰顺县泗溪镇（原属平阳归仁），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任中书舍人等，有《文集》十卷，其《游白云山》描写家乡风貌如画，可以说是拓展了浙江山水文学所描写的领域，前所未有：“上白云山溪径斜，霏霏仿佛载仙槎。盘旋藤道锁深霭，葱郁春林带落霞。神迹峰灵非绝地，仙踪洞杳别人家。蜿蜒变态无穷趣，倏有浮岚眼底花。”再如吴昙（1156—1236），瑞安义翔（今属泰顺）人，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官终朝议大夫，有《锦谷庵偕友人栖游偶作》诗，也是写泰顺一带奇特景致诱发出人们的无比游兴与创作情志：“谷静水更好，山深岩又奇。岫中云欲出，展意入新诗。”又有吴昙的同乡，也是瑞安义翔（今为泰顺县新浦库车）人的吴驯（1167—1247），字由正，宁宗嘉泰二年（1202）武举，官终武经大夫，有《岚壁集》。《百花岩》诗简洁有致：“一岩千古异，百卉四时开。不假栽培力，天然锦绣堆。”

① 详参夏咸淳：《明代山水审美》，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浙江山水文学诗、词、曲、文、赋等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善，借用严维《余姚祇役奉简鲍参军》的话来说，即是“歌诗盛赋文星动”。就山水诗来说，有时候也很难完全可以确定：一些从题目上看好像是山水诗，但实际侧重点并不在于山水景物的描写，甚至几乎没有山水成分，如秦系（720？—810）《访会稽山居》，粗看以为写的是山水诗，但从内容上判断，最多也只是田园诗，不应作山水诗看待（田园诗与山水诗，同中还是有异，此处不做展开论述）：“忽道仙翁至，幽人学拜迎。华簪窥瓮牖，珍味代藜羹。洗砚鱼仍戏，移樽鸟不惊。兰亭攀叙却，会此越中营。”一些则刚好相反，诗题上看是送别、酬赠或其他题材（笔者《唐诗审美艺术论》一书专门论及唐诗中的送别、酬赠等题材），[①]但实际却可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山水诗，如权德舆（759—818）《戏赠天竺灵隐二寺寺主》是一首酬赠诗，但其实质内容，则应该算是较为标准的山水诗了：“石路泉流两寺分，寻常钟磬隔山闻。山僧半在中峰住，共占青峦与白云。”同样是权德舆，《早发杭州泛富春江寄陆三十一公佐》情况又有些不一样：“候晓起徒驭，春江多好风。白波连青云，荡漾晨光中。四望浩无际，沉忧将此同。未离奔走途，但恐成悲翁。俯见触饵鳞，仰目凌霄鸿。缨尘日已厚，心累何时空。区区此人世，所向皆樊笼。唯应杯中物，醒醉为穷通。故人悬圃姿，琼树纷青葱。终当此山去，共结兰桂丛。”诗题像山水诗，且诗中也有一定的山水描写，但却很难认定是山水诗。对于种种复杂的文学创作实情，本文尽量给予准确的定位，并做出相对合适的处理与安排。何况，任何一种文体形成的原因都是多元的，不同的文体各有属于自己的艺术规律，人们必须予以遵循。浙江山水文学家不断耕耘，辛勤探索，融会贯通，终臻极致。张可久《小山乐府》的山水散曲正是这一山水交响旋律中不可或缺的音符，迥然有异于他人。赵孟頫、徐渭融书画之长于山水诗文，精美绝伦，有力地拓展了山水文学的艺术空间。

郁达夫在《闲书》中说：“欣赏山水以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情。”进而认为：“所以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浙江山水文学家深谙观山水之法，山情水系了然于胸，不断变换角度审视自然，写出山水精神，使人们从山水形象以及由此创造的意境中去领略大千世界之美；同时对山水文学的产生、发展等等都进行了深层的探索，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各自有别的山水审美思想，时有高论宏裁，因为“山川即文字耳”（王思任《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略举

① 参看何方形：《唐诗审美艺术论》，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数例。张先《喜朝天·清暑堂赠蔡君谟》就有“江山助诗才”的表达。又如贝琼《游冶亭记》:“君子不观山川之胜,无以广其志,宣其文。”王祎在《马迹山紫府观碑》中认为:“夫宇宙间名区奥壤,大抵扶舆清淑之气所钟,然必得至人高士为之增重,而后益有以显其灵,所谓地以境而胜,境因人而著也。”宋濂《题〈北山纪游〉卷后》说:“人物固借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则专倚乎人物为之引重。”王思任《〈游唤〉序》称:“夫天地之精华,未生贤者,先生山水。”山水而遇真正的贤达之士,人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才有真正的山水文学。几乎在同一时期,陈函辉(1590—1646)在赠徐霞客的《纪游》诗中承接王守仁“烟霞有本性”(《青原山》)的思想,提出“山川有性情,岂许人批抹”的观点,道出了山水文学创作的更高要求。人们只有遵循自然山川的本性,才能发现美,享受美,表达出美的意蕴。戴良(1317—1383)为郑觉民(1300—1364)《求我斋文集》所作的《序》中称:“昔人自谓文章与世相高下,然亦恒发于山川之秀,本诸文献之传。以鄞一郡观之,其地环以大海,而四明、骘骑诸山往往趋海而尽。士生其间者,率伟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遗风。……若先生者,岂非有得于山川之所发、文献之所传而致然耶?”宋濂《送陈庭学序》叙写天台陈庭学历览蜀中山水后发而为诗,“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侈矣”,由此进一步论述:“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由此可见,山水文学创作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文艺观念的变革与提升。

中国古代山水纪游文学的收集、编辑工作也基本上是由清一色的浙江文学家完成的,这又为文坛生色不少。自南宋陈仁玉(1212—?)辑《游记》首创,元明之际陶宗仪(1329—1412?)再辑《游记续》,至明代何镗辑《古今游名山记》、慎蒙辑《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杨尔曾辑《新镌海内奇观》,继承也是很明显的。王士性《寄吴伯与学宪》则认为:“振卿(何镗字)本虽冗,而蒐辑之功多,至慎氏删而节之,参以鱼目,便成恶道。足下校文之暇,何不取其书笔削成一家言,亦奇事也。”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浙江本土家世居里及占籍的作家,适当考虑一些不是浙江本土,但却在浙江生活时间很长的客籍作家,也突出部分描写浙江山水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因人因事而异,将做出适当的安排与处理。李益(750—830?)《送襄阳李尚书》有“诗情满沃洲”的赞叹,扩而大之,中国文化史上还真可以说存在“诗情满浙江”的现象,很值得探索。具体作家以生年为准,有些特殊情况另做安排。生卒年不详者放在相对合适的位置给予适当介绍。拙著所论说的浙江山水文学以浙江作家反映浙江山川风

貌的作品为主。时间上则参照本人《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的标准，下限为公元 1911 年。①

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于个性，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个性因素。研究文学史，要讲求从历史的高度俯视，以探古人之真精神；但研究古代文学现象，又不能不关注其现代价值。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近年在地方文学发展进程的梳理与研究方面用力甚殷，成果显著，开掘出新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省分地区的文学史不断涌现，再具体而微者，由此形成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全新思路。几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有着极为复杂的精神意绪，研究课题的历史跨度这么长，深知要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并对历史现象做出准确而完整的判断，梳理山水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并对如此悠久的文学传统做出现代阐释，挖掘山水美学的真谛，阐发文化内涵，诚非易事。文中所论，也许都是揣摩研读之后的一己浅识鲰见，但力争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最后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则有待时间的检验，这只能待以后有机会再做修补。严维《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新诗酌茗论"，贯休《桐江闲居作十二首》之七则说"诗好抵琼瑶"，研读之不能不心思专一。拙著在笔者已有的《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唐诗审美艺术论》等相关成果基础上，以史为线索，以作家的作品为基点，全面展开时代审美思潮、作家生平、诗文创作的精神意蕴、艺术拓展与旅游文化资源等方面的综合论述，既宏观地把握浙江历代山水诗文的艺术走向，又对名家名篇进行具体的艺术剖析，力争对根植于不同时代社会土壤的诗文有较为正确的理解与把握。同时，既突出大家、名家，又适当注重地域之间的相对平衡，对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市的山水文学创作现象尽量都有所涉及。同样，在选取山水文学作品时，既着重歌咏名山大川的作品，也放眼整个浙江山水，对一些吟唱浙江大地上并不为人所知但却颇具自我特征的丘山与沟壑的篇章适量安排。

山水文学是文化与文学有机融合的艺术结晶。拙著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文学问题，以期获得更大的探究空间。具体地说，就是把山水文学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观照，寻求文学的生成环境。拙著尽力讲求结构的相对平衡，在此基础上，对一些现象的探讨能有所掘进或拓展，并对一些个案做较为细密的分析；同时，并不因人废文，而是不拘成说，对一些政治等方面并没有留下多少好名声，但在山水文学领域却有所成的人给予适当的关注。为了深入探索山水文学所独具的艺术奥秘，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

① 何方形：《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基础上加以深化。未来永远充满生机与希望。笔者很赞赏法国著名美学家德拉克罗瓦(1798—1863)的良好期望:“真正的美的历史,尤其是美的演变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空白,我们将来要把它填补起来。那时我们将要见到,这种永恒不变的与令人崇敬的理想,以无尽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① 拙著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为之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吧。

当一切都逐渐沦为历史印痕的时候,人们很难再现过去历史的全部真实。拙著在写作过程中固然已是广鉴前贤,力求去伪存真,但也难免有思虑不周之处和以管窥豹之弊,这不能不成为一种历史的遗憾,还望方家正之!如何全面描述、准确评价浙江历史上的山水文学创作现象,把握人们对时代精神的忠实感受,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兼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话题,需要人们不断为之努力。

第一节 浙江历史、地理简述

欧明俊在《陆游研究》的《引言》中强调:“古代文学研究,要重视大环境、大背景,还要重视小环境、小背景,更要重视具体的情境,应做具体而微的深入分析,避免廓大空泛之论。”②艺术离不开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土壤的滋养。无论就具体的作家来说,还是就一个文学现象如时代性文风变迁而言,都是如此。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都不是与时代隔绝的孤立的艺术品,而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情趣等等都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

一 沧桑之变

摸清历史脉搏,是为了更好地按照历史的流向描述文学现象,在大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文学本体,立足于大的时代背景进行全方位观照,避免凿空之论,以期求得历史真实。同时,诗歌又是时代的多棱镜,从中折射出生活的丰富多彩。

“越郡佳山水”(权德舆《送上虞丞》),沧海桑田几多情。浙江是一个美丽而又洋溢着鲜活生气的所在,民丰物阜。浙江也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1974 年,从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乌龟

① 〔法〕德拉克罗瓦:《德拉克罗瓦论美术和美术家》,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 页。

② 欧明俊:《陆游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 页。

洞内发现的“建德人牙”化石鉴定，早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丰富的古文化遗存。1973年成功发掘的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证明南方长江、钱塘江流域与北方的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非原先认定的化外之所。嘉兴的马家浜文化是继承河姆渡文化因素发展而来，再往后面发展，就有了1936年发现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良渚文化。全省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百处以上。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隋书·地理志》也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信鬼神，好淫祀，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浙江古属扬州地，后建有越国，浙江大部属之，唯现在的湖州、嘉兴部分地区属吴。《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而奉守禹之祀。”战国时期楚灭越，浙地入于楚。“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荀子·荣辱》），自古而然。公元前222年，秦置会稽郡，与鄣、九江二郡同属扬州，今浙江中、北部属之。会稽郡计26县，其中在浙江境内的有山阴、句章、乌伤、太末等县。次年置闽中郡，今浙江东南部与福建一部分属之。汉顺帝刘保永建四年（129）以钱塘江为界，分设原会稽郡为吴郡和会稽郡。三国时，浙江地入东吴版图，增设临海、东阳、新都、吴兴等郡。

历史在艰难中演进，而在时代的推迁过程中，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段落。中国社会的王朝更迭也影响了浙江的历史进程，沈约《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六朝时代祚短命促，战争不断，中土士民南迁，浙江经济得到较大程度上的开发。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称：“会境即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开发利用。《通典》卷一八二《州郡》第十二载：“永嘉以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唐宋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全国分设为十道，浙地属于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江南道为东、西两道，浙地属于江南东道。肃宗乾元元年（758），江南东道又分为浙江东道与浙江西道两节度使。浙江第一次作为行政区域名出现。钱镠（852—932）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任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尽有今浙江之地。后定杭州为西府，正式建吴越国，采取保境安民、轻徭薄敛的策略，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其孙钱弘俶降于宋。宋初，浙江地区属两浙路。南宋时，分设为两浙西路与两浙东路。钱穆先生

有这样高卓的见解:“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①]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就浙江的经济、文化而言,也与这一自然天惠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浙江本为地瘠民贫之地,《管子》卷一四《水地》所谓“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因为远离兵燹,给人们以休养生息的更大空间。宋室南迁,浙江历史更是进入一个辉煌的时期。

元朝的建立,给中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本土文化造成一定的历史断裂,形成一个独特的历史语境,民族记忆由此进入一个特定时期。浙江也走到历史的拐弯处,但也正是这一时期,即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166),以在杭州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为标志,浙江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名,正式得以确立。元朝统治者不恤民困,生灵涂炭,终于酿成红巾军起义。明清以后,浙江一直作为一个相对稳固的省级地域存在于中华大地。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特定历史范畴的产物,反映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以及时代的变迁。浙江山水文学发展进程也都留下时代的印痕,有历史的嬗变演化的轨迹。

二 山海之胜

地理环境虽本身不是文化,但它却是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石。管子说:“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经脉之通流者也。”(《管子》卷一四《水地》)浙江位于中国的东南部,北与江苏、上海连接,西靠安徽、江西,南与福建接壤,总面积十万余平方千米。浙江全省北部地势平坦,西、南多被丘陵阻隔,东际于海,浩茫无际,天造地设,为寰宇绝胜处。邵晋涵(1743—1796)为陶元藻(1728—1801)编纂的《全浙诗话》所作《序》称“浙江山隩而水复,多韬光匿采之士”,阐述了浙地山水与两浙文人精神意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各呈异态又能相映成趣的胜迹能够在获得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提供人们一个展现才情的上好机会,山水自然与文学创作往往又得以融而为一。“盖人为地面产物,既受地面教育,亦受地面限制。故任何地区之作家,或有形,或无形,必受地理环境之薰染,即或超奇之辞人,发其神秘之玄思,铸成划时代之作品,亦不能自外于地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6 年修订第 3 版,第 70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